

高陽著

粉墨春秋 (中)





ISBN 957-39-0125-0



00420



9 789573 901259

© 1990 THE VISTA PUBLISHING CO.

高陽著

粉墨春秋

粉墨春秋

高陽作品集 B¹⁹

作 者	高	陽
發行人	沈	恩
登	登	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郵局 7—501 號信箱	
郵撥	0 7 6 5 2 5 5 — 8	
電話	(02)22553522	27540696
傳真	(02)22553588	27540691
香港	田園書屋	
總經理	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	
印刷	紅藍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	
	台北市西園路二段 281 巷 3 號	
定價	全書三冊新台幣 420 元·港幣 140 元	
初版	1 9 8 7 年 2 月	
八版	1 9 9 8 年 2 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125-0

法律顧問：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 尤英夫律師

第二部

Ⅰ 迴風小舞

司徒雷登願作調人

其時爲日本新聞界稱之爲「和平運動參謀總長」的周佛海，對「組府」正起勁之時，在上海招兵買馬，許下了好些「部長」、「次長」，而且連「新政府」的預算都編好了。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解決，以致於那一天才能粉墨登場，卻是個未知數。

一個問題是青天白日旗上的飄帶。汪精衛堅持要取消，而日本軍部特地召集華中、華南、華北三個派遣軍的參謀長，在東京開會研究，一致表示：青天白日旗上掛飄帶，作爲「汪政府」的「國旗」，已是最大的讓步；如果連這條飄帶也要取消，變成敵我不分，不但在實際作戰上有妨礙，最嚴重的是會影響軍心，萬一發生譁變情事，勿謂言之不預。

• 秋春墨粉 •

提出這樣的警告，日本軍部自然堅持原議；汪精衛也知道事實上有困難，只能拖着再說。再有一個問題是今井從香港回日本以後才發生的。原來關於「汪政府」的國際地位問題，周

佛海曾經與日本外務省的代表加藤談過，「汪政府」自稱為「還都」，並非成立「新政權」，所以無所謂「承認」問題。周佛海只要求日本派遣「大使」，向汪精衛呈遞「國書」。

加藤的答覆是，日本派特使不派大使，不遞國書。周佛海表示，倘或如此，組成「新中央政府」毫無意義。談得一場無結果而散。

當然，讓步的必是騎虎難下的一方，周佛海跟汪精衛商量，用與日本當局同時發表宣言的方式，作為日本對汪精衛「組府」支持的表示。這個方式是影佐禎昭所同意，而且認為很合理的；但到東京去了一趟，他的態度改變了。

「貴方發表宣言，日本方面不便阻止；但日本不發表宣言響應，不表同意，亦不否認，採取默認態度。」影佐接下來將與今井商量好的解釋說了出來：「因為公然承認，則日本右派及帝國主義者，必然反對，不能不事先顧慮。」

周佛海愕然，「汪先生的宣言，日本固不否認；可是，」他問：「日本的議員或者記者提出詢問；日本政府如果稍為表示：這是中國片面的希望。那一來，汪先生宣言的效力，豈不是完全打銷了？」談來談去談不攏，只好約定第二天一起去見了汪精衛再作道理。

到得第二天一早，影佐忽又不速而至；一見面便問：「汪先生跟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，是否熟悉？」

司徒雷登是美國人，他的父親是早期來華的傳教士；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國。周佛海認識

此人，並不相熟；如今聽影佐這一問，料知有話，考慮了一會，還是據實作答。

「他到上海來了；要由香港轉重慶。我昨天跟他見面。」影佐緊接着說：「他對全面和平，倒也很熱心。」

一提到這一點，周佛海心情有些矛盾，全面和平固然是內心的希望；但一談到全面和平，對於「組府」便橫生好些障礙；日本軍部不肯發表宣言響應，亦就是爲了留下跟國民政府的和談之路。如今橫刺裏又殺出來一個司徒雷登，眼前的情勢，恐怕要弄得很複雜了。

心裏是這麼想，表面上當然表現得頗爲興奮的樣子，「喔，」他問：「他怎麼說？」

「他說，他在北平跟王克敏談過，希望王克敏出任蔣委員長及汪先生中間的調人。」

這就有點匪夷所思了！周佛海心想，司徒雷登在華多年，何以政治行情，一無所知？王克敏具何資格，能任此調人？

「不過，我們從另一方面接到的電報，與此不同。」

「所謂另一方面，是那一方面？」

「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。」影佐停了一下說：「據說，司徒雷登本人想出任重慶與東京間的調人，託王克敏向岡村大將，探詢意向。」

這兩種情況，大不相同；王克敏雖沒有資格擔任重慶與東京的調人，但司徒雷登有美國的背景，甚至可能是華府白宮或國務院的授意，擔任重慶與東京的調人，不但够資格，而且是非常值

得重視的一件事。

「那末，」周佛海問：「岡村大將作何表示。」

「岡村大將覺得這件事不應該由他答覆；所以打了電報給西尾大將，請求指示。」

西尾就是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；周佛海心想，此事即使是西尾，亦未便貿然作決定性的答覆，便即問說：「西尾大將當然要跟東京聯絡？」

「是的。一方面跟東京聯絡；一方面要我來聯絡，西尾大將想知道汪先生跟周先生的意向。」

聽得這話，周佛海大感興奮；因為西尾壽造沒有撇開汪精衛，證明日本軍人還是講交情的。否則，重慶與東京，通過司徒雷登直接聯絡，汪精衛成了局外人，不僅沒有發言的餘地，而且連內幕都無從獲知，那時地位，豈不尷尬？

「周先生，」影佐最後才道明真正來意：「司徒雷登提出要求，希望通過我們的關係，請你跟他們見一次面；談談汪先生跟你對全面和平的意見。」

這一下，周佛海不由得躊躇了。原來他的根本目的是：「組府」第一；談和其次。以為有了「政權」在手裏，就是有了一筆政治資本。但「組府」之事，從「高陶事件」以後，各方的空氣不佳；全虧得周佛海在那裏極力拉攏。如果傳出消息去，說他與司徒雷登有所接觸；大家都會想到：必與中日談和有關；既然要停戰談和了，「汪政府」當然不會再出現。見機而作，避得遠些

；否則「新貴」做不成，落個準備「落水」做漢奸的名聲，太犯不着。這一來，不就等於矮下的楚歌，一夕之間，楚軍瓦解！其事不可不慎。

但是，儘管影佐一直是支持他的；卻由於他也一直跟影佐表示，只要有全面和平的機會，個人的得失算不了甚麼。如今機會來了，倒說退縮不前，豈非言不由衷，平白讓人把他看得矮了半截？

因此，他決定採取拖延策略，「要見面，就要談得很具體；不然不如不見。」他說：「容我先跟汪先生談了，再給你答覆。」

事實上他沒有去見汪精衛；而是跟他的智囊之一，岑春煊的兒子岑德廣去商量。岑德廣毫不遲疑地說：「這機會當然不容錯過。不管談些甚麼，你總要跟他會一面。」

周佛海想了一下說：「問題是，我去看他，他來看我，都不方便。消息一洩漏出去，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犬。」

岑德廣當然了解他的言外之意，「那也容易！」他說：「你跟中間人約定時間、地點，到時候我派車去接，在我這裏見面。即或消息洩漏，只說不期而遇就是。」

「不錯，不錯！人生何處不相逢？」周佛海認為這樣做不露痕跡，同意照辦。

「公博，快回來了吧？」岑德廣又問。

陳公博早又回香港了，他對「組府」本不感興趣，從高陶事件以後，態度益發消極，此時岑

德廣問到，周佛海嘆口氣說：「汪夫人預備親自去勸駕，來不來未可知！」

「有公博在這裏就好了；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見面，可以表示和平的願望是一致的；以後報告汪先生，有公博在場也比較好說話。」岑德廣接着問道：「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談一談？」

「你看呢？」

「我覺得事後告訴他比較好。」

周佛海考慮了一下，點點頭說：「有甚麼事，只有我先挺下來再說。」

×

×

×

見面的日子，定在二月十二日；到了約定的時間，岑德廣派了一輛車，將司徒雷登及他的秘書傅涇波，接到了愚園路岐山村的住宅，周佛海已經等在那裏了。

經過短短的一番寒暄，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亂真的杭州話說道：「我等於一個中國人。」

就這一句開場白，周佛海與岑德廣對這個高大的美國朋友，立即有了一種很微妙的親切感，不約而同地深深點頭，表示領會到他的立場。

「蔣委員長勵精圖治，這幾年來國內無論物質上的建設，精神上的培養都令人刮目相看。不幸地爆發了七七事變，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國的進步，內心不安之故。」

周佛海接口說道：「我要說明，日本看到中國進步，內心不安，誠然有之；不過那是日本軍

閱的心境，而且也只是有一部分日本軍閥，像松井石根、杉山元之流。」

「是的！因此，中日之間的和平，在日本方面出現了機會；現在是中國方面的問題。將近兩年的作戰中，已證明了中國的軍事力量，尚不足與日本相敵。如果此時求得合理的和平，給英明的蔣委員長幾年生聚教訓的時間，仍舊可以跟日本一決雌雄。」司徒雷登緊接着以鄭重的神色說道：「這完全是我把我當作一個中國人所說的話。」

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」周佛海說：「事實上，我們內心中也是這樣想法。」

「你所說的『我們』，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內。對於汪先生倡導和平，我極表贊成；不過傳聞汪先生將另組『政權』，如果所傳是實，那是中國的另一大不幸。」

「喔，」周佛海以極沉着的態度說道：「請司徒博士作個簡單分析。」

「很顯然地，在對外作戰時，內部和戰的步驟，不能一致，已是一個弱點；如果造成分裂，更非國家之福。」

「司徒博士的看法，就一般而言，是不錯的。不過，一時分裂的現象，也許反可以發生加速復合的力量。」

「分裂之後再復合，裂痕總歸存在的。」司徒雷登不願在這個問題引起爭執，話鋒很快地一轉，「我這次到重慶，會謁見蔣委員長；很願意將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轉達蔣先生，謀求一個共濟之道。今天想跟周先生見面，就是爲了想了解汪先生方面的意見。」

「司徒博士的熱誠，我們感激而且佩服。不過，以蔣先生目前的處境，已無法與日本交涉和平；目前進行組織『政府』，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個立場，以便利進行交涉。如果我們的『政府』在組成以前，重慶跟東京的和談，已經在進行；那末成立新『政府』這一層，自可從緩。倘如重慶與東京能够達成停戰的協定，則新『政府』雖已成立，亦可隨時取消。」

這樣澈底的表示，司徒雷登爲之動容；便進一步問道：「照周先生的說法，不知道汪先生是不是同意？」

「我們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，保證履行我剛才所說的一切，請司徒博士代爲向蔣先生表明：我們所做的事，純在求取全面和平，決不會成爲重慶與東京和談的障礙。」

岑德廣所提出的，如果和談實現，希望美國居間保證。周佛海不贊成他的這種主張，因爲不論如何，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事，邀請另一國居間保證，無異自請他國來干預內政；不過司徒雷登已經很爽快地作了承諾，也就不必再提任何異議了。

「周先生，」司徒雷登又說：「我大概在月底才會從上海動身；如果汪先生還有甚麼意見要我帶到重慶，我是樂於效勞的。」

周佛海知道他的言外之意，對於他剛才所說的，可以代表汪精衛保證「新政府」將不會成爲和談障礙的聲明，希望進一步獲得本人的確認；因而毫不遲疑地答說：「在司徒博士啓程以前，不妨再敘一敘；我可以把汪先生在這方面的意見，詳細奉告。」

2 悔不當初

陳公博、周佛海悔殺當年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

談話到此，可說是到了圓滿結束的時候；但司徒雷登興猶未央，而傅涇波卻又提出一個深具意義，也令人深感興趣的問題。

「我們研究過汪先生和周先生倡導和平的動機之一，是爲了反共；華北日軍司令多田駿曾經表示，希望蔣委員長改變容共抗日的政策；而據說『新政府』使用的青天白日旗上面，有『和平、反共、建國』的字樣，說明了中日和平與反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。但是，大家都知道，周先生與陳公博先生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催生者；由發起共產黨到堅決反對共產黨，是甚麼力量來推動了這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？」

「理論！」周佛海平靜而簡潔地答了這兩個字；「不過公博是就經濟方面看透了馬克斯主義根本不通；我是從鹿兒島七高畢業以後，升學京都帝大，聽了河上肇博士的課，又徹底研究了他

的著作，從政治方面看透了馬克斯主義在當前的中國，根本不能實行。」

「周先生參加共產黨，是在七高時代？」

「是的。那是在一九二一年夏天；在上海舉行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』。出席代表十三人；代表上海、北平、長沙、廣州、武昌、濟南這六個地區的五十七名黨員。」

「只有五十七個人？」

「是的。像廣州，公博跟譚平山叔姪一共三個人，就成立了廣州共產黨。那次廣州的代表就是公博；我跟毛澤東是長沙的代表。但是所謂『南陳北李』都沒有參加；因為——。」

因為『北李』李大釗主持北大圖書館。暑假正是整頓內部的时候，他身為館長，不容他請假南下；『南陳』陳獨秀則方為陳炯明聘為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，亦以同樣的理由，無法分身。因此，這一次『大會』的主席，就由曾經去過俄國的張國燾擔任。

「據公博後來告訴我，他之脫離共產黨，就起意於對張國燾的不滿；公博一向喜歡觀人於微，當時張國燾的處置，我倒並不以為不當，而公博看出來了，事情是這樣：最初決定，開會為了安全問題，應該逐日更換地點，但一連四天，都在法租界貝勒路，上海代表李漢俊家開會。公博便問張國燾何以與原議不符？你們知道張國燾怎麼說？」

張國燾說：李漢俊是有問題的，他的主張不是列寧的理論，而是克倫斯基的理論；他是黃色的，不是赤色的。原來俄國一九一七年發生的「二月革命」，是軍隊不奉政府彈壓罷工工人的命

令；國會亦起而反對政府；俄皇下令解散國會，而國會置之不理，成立了臨時政府，由克倫斯基擔任主席。不過，臨時政府雖由專制改爲共和，但實權操在資產階級手中，所以當時認爲「二月革命」乃是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」；以後在作爲俄共黨史的「簡明教程」中，更一再強調，臨時政府是「資產階級專政」；這與列寧的「無產階級專政」的理論，自然水火不容。

然則這一連四天在李漢俊家開會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張國燾說，因爲李漢俊的立場有問題，所以在他家開「大會」似乎已引起他的恐慌；「他越是恐慌，我們越要在他家開會！」張國燾這樣很得意地對陳公博說；臉上的神色，彷彿是虐待狂者獲得滿足時的反應。

陳公博卻大起反感，認爲既屬「同志」，應該相見以誠，相待以義；張國燾這樣做法，不僅故意與李漢俊爲難，甚至連「同志」的安全都不顧，共產黨開第一次「代表大會」，便有這種同舟敵國的現象，使得陳公博內心的滿腔熱情，頓時降到零度。

再有件事，氣得陳公博幾乎要退席。有一件提案是：禁止共產黨員參加政治，連教員都不許當。也許張國燾是希望逼着共產黨員去當「無產階級」的「工農」；以爲參加政治就是做官，與組織的要求不符，但何至於連從事教育都不許？豈非荒謬絕倫！

儘管陳公博全力反對，但在張國燾堅持之下，居然照案通過。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開會時，張國燾自動提出取消前一天的決議；陳公博自然要提出質問。張國燾的答覆是：俄國代表的意見。

原來那時「第三國際」有兩個代表派在中國，一個叫吳庭斯基，一個叫馬林；組織中國共產黨，即出於吳庭斯基的策動，在這次「全代會」中，儼然君臨的姿態，陳公博本就有些看不慣；現在聽張國燾恬不知恥地表明，一兩個俄國人竟可推翻「大會」通過的議案，自然氣憤難平；疾言厲色地說：「這樣子不必開什麼會，只由俄國人發命令算了！」當場衝突，不歡而散。

到得最後一天，終於出麻煩了。他們開會總是在晚上，這天人還沒有到齊，正在閒談時，李家的僕人上樓報告，說有一個面生可疑的人在問他：你們經理在家不在家？一聽這話，深具秘密工作經驗的吳庭斯基和馬林，立刻主張解散。於是張國燾領頭，紛紛下樓，開了前門逃散；上海的「弄堂房子」習慣由後門出入，所以前門反變成比較安全的「太平門」了。

陳公博本來心惡張國燾不顧「同志」危險，專跟李漢俊爲難；及至急難來時，先就逃得快，那就不但心惡，而且心鄙了。此時他一方面覺得有跟李漢俊共患難的必要；一方面也想了解張國燾何以對李漢俊的惡感如此之深，所以留下來不走，想跟李漢俊談談。

李漢俊開了一聽長城牌香煙，一人抽了一支，談不到三、五句話，三個法國「三道頭」帶着四個「包打聽」上樓來了。

「不准動！」有個包打聽大喝一聲。

李漢俊想盡主人之禮，坐在那裏探手去取煙罐，準備敬客，那知手剛一伸，又嚇一大跳！

「叫你不准動，就不准動！」聲音愈來愈粗暴了。不許動，不許說話，甚至不許喝茶——怕

茶中預置了毒藥；不過煙罐就在陳公博面前，他取煙抽，卻未被禁；一支接一支，等搜索了一個多鐘頭，又問了李漢俊許多時候的話，恰好四十八支煙抽完，就輪到陳公博受訊了。

陳公博不懂法語，「包打聽」翻譯着說：「總辦大人問你是不是日本人？」

陳公博大為詫異，便用英語問「總辦」：「你能不能說英語？」

「行！」總辦用英語問：「你是不是日本人？」

「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，我不懂你爲甚麼懷疑我是日本人？」

「現在我更加懷疑了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你似乎不懂他說的中國話。」

「那有這回事？」陳公博轉臉用廣東味道的「京腔」向包打聽說：「他說我不懂你的話；請你告訴他，我懂不懂。」

等包打聽爲他證明以後，總辦問道：「你這次由甚麼地方來？」

「我是由廣東來的。」

「來幹甚麼？」

「我是廣東法專的教授，暑假到上海來看朋友。」

「看那些朋友？」